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

XIAMENDAXUE MAKESIZHUYI YU ZHONGGUOFAZHAN YANJIU WENKU

红旗卷起农奴戟

——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研究

王明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

XIAMENDAXUE MAKESIZHUYI YU ZHONGGUOFAZHAN YANJIU WENKU

红旗卷起农奴戟

——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研究

王明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旗卷起农奴戟：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研究 / 王明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662 - 0

I. ①红… II. ①王… III.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
IV. ①K2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07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徐 申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45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杨振斌

副 主 编 陈振明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红梅	白锡能	杨振斌	苏 劲	张有奎
陈炳辉	陈振明	陈喜乐	林东伟	林金忠
徐进功	徐梦秋	赖小琼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发展的理论指南

（总序）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种种迥异的思潮和主义粉墨登场，又纷纷黯然退去了，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成长壮大并取得最终胜利。这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开创并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史诗般的成就。在可以预见的今后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将是继续引领中国发展的理论指南。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了解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套用，而是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前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任何固守本本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然，修正主义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是遥

2 红旗卷起农奴戟

远的梦想，而是现实可期的事业。然而，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如何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出发给予理论的解答。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紧密联系，试图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库》的基本思路之要点在于：一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坚决反对种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要求埋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力求阐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辩护。二是强烈的创新意识。我们偏重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突破成见的创新之作，偏重于结合时代新特征新情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研究。三是凸显中国问题。我们聚焦于中国新形势下的各种深层矛盾和话题，青睐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中国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四是倡导“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我们竭力避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的作品，始终不渝地追求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佳作。

编者

2013年5月

前 言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以苏维埃和土地革命作为主要内容。苏维埃表现为工农兵代表大会形式的民主政权,土地革命则涉及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共党史学界目前对土地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本书认为,对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仍然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目前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目前研究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描述,与当时历史实况存在相当距离。无论是中共中央重点经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或称苏区),还是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均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期待存在较大反差。这主要表现在苏维埃独立权威不足,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现象十分严重;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性不足、阶级性不鲜明两方面。而对于上述历史现象,当前研究明显关注不够。

其次,目前对土地革命的研究虽然比较对苏维埃的研究深入,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由于中央苏区是当时中共中央重点经营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对中央苏区的研究明显偏重。但是目前研究往往把对中央苏区研究的经验狭隘地经验化,把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作为衡量其他苏区土地革命水平的天然尺度。其实,中央苏区的开辟也存在一个由地方经验上升到国家全局战略的过程,所以,如果简单以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为尺度,不仅会使研究者在对其他苏区的研究中,忽视其各自发展的地方特性和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也不利于对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本书认为,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存在着自身探索和彼此借鉴的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历史规律的一致性,也体现出地方经验的独特性。目前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土地革命通史类著作,还是各革命根据地区域史类著作,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问题。

本书有意识解决以上两方面问题。在苏维埃政权问题上,本书毫不讳

2 红旗卷起农奴戟

言苏维埃政权建设存在的党包办等实际问题;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本书突出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地方特色,试图纠正以中央苏区经验统摄全局的研究范式。同时,本书在以上努力的基础上,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体系建设做深入研究。这是因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所引起的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上;而财政体系体现着一个政权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所以理所当然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缺乏和平建设的环境下,经济工作呈现显著的战时经济特色。农业生产以季节性生产动员和粮食工作为重点,而商业贸易工作则表现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斗争。在农业和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体系逐渐向正规化和科学化方向转化,有意识地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经营模式。财政体系的基础是一系列以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和会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础制度建设。税收制度则体现出以经济建设为方向的正规化和科学化方向。虽然银行制度的运转在各根据地均不理想,但是仍然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金融保障。

列为研究个案的革命根据地,理所当然包括中央、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这六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分别作为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三个根据地历史延伸的西北、川陕和湘鄂川黔三个根据地。其他较次要苏区的选择,取舍标准除了拥有相对长的建政历史和较稳定的控制或影响区域,以及建立有省或相当省一级的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外,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是必须实际实践过土地革命。因此,左右江根据地虽然建政时间不到一年,但是因为拥有较稳定的区域,更因为实际实践了土地革命,所以纳入考察范围。东江、陕甘边、陕北、琼崖四个革命根据地虽然因为斗争历程波浪起伏较大,区域并不稳定,但是也因为实际实践了土地革命,而纳入研究范围。最后,作为北方苏维埃运动特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也纳入研究范围。而川滇黔、鄂豫陕两个根据地则因为建政过于短促,更由于没有实际实践土地革命而遗憾地没有纳入研究范围。至于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以及闽东革命根据地,因史料暂时缺乏而只好暂付阙如。

本书第一章考察土地革命早期从暴动到苏维埃的进程。第二章到第十章,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做专题研究。第二章考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章考察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第四章考察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考察中央苏区的三个“卫星”苏区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第八章考察华南的东江、琼崖和左右江三个革命根据地。第九章考察北方的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以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第十章考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从暴动到苏维埃	(1)
第一节 革命暴动的艺术	(1)
第二节 井冈山斗争时期关于“军事路线”和“群众路线” 的争论	(23)
第三节 海陆丰苏维埃政治文化研究	(37)
第二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53)
第一节 平等与效率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查田运动	(54)
第二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演变新探	(73)
第三节 “剪刀差”问题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经济	(88)
第四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以党代政现象探析	(98)
第五节 法国公法理论观照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	(106)
第六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区三省的战争动员与土地革命	(117)
第三章 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 财政经济	(128)
第一节 “去地方化”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128)
第二节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150)
第三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165)

2 红旗卷起农奴戟

第四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174)
第四章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 和财政经济	(187)
第一节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187)
第二节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规化与科学化财政 体系的逐步建立	(198)
第三节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208)
第五章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218)
第一节	在争论中探索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219)
第二节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233)
第三节	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238)
第六章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262)
第一节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262)
第二节	从“共耕”到“平分”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267)
第三节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281)
第七章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293)
第一节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294)
第二节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308)
第八章	华南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326)
第一节	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326)
第二节	琼崖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352)
第三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364)
第九章	北方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378)
第一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规化建设和土地 革命	(378)

第二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390)
第三节 苏维埃运动的特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397)
 第十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405)
第一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历史继承	(406)
第二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时代特色	(412)
 结语	(421)
参考文献	(422)
后记	(439)

第一章 从暴动到苏维埃

第一节 革命暴动的艺术

中共党史学界普遍认为 1927—1928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或暴动），是其后土地革命的先声。党史学界对革命暴动的学术重要性已经给予高度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尚缺乏整体性的综合分析。^① 本书认为，除南昌起义外，各地武装起义都是对“八七”会议精神的响应和发扬，具有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应具备综合考察的基础。同时，本书认为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的相关框架，对这些起义做微观分析，有助于剖析暴动进程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脉络，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社会运动理论”其实是对传统经典革命研究的反动。“二战”后欧美新兴的新社会运动，提醒学者们以逆传统常规的视角，关注那些在社会动员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对抗程度上并不逊色于经典革命进程的新社会运动。20 世纪末期由苏联、东欧所谓“民主化”浪潮开始的，直到 21 世纪初仍然方兴未艾的一系列全球性的社会冲突，以其暴力因素的重新回潮和斗争手法的不断创新，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实证基础。当暴力斗争的最集中体现——革命仅被作为社会运动进程来理解时，暴力革命中的一些内在机理可以得到更深入的剖析。因为“当某一革命轨迹中所发生的情形被看成是许多因果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时，革命轨迹中所发生的种种

^① 唯一对 1927 年、1928 年武装暴动做综合研究的著作为黄琨的《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该书仍然在重复传统党史著作对革命暴动为“左”倾盲动错误表现的指责。特别是该书反复强调共产党方面力量的薄弱和国民党方面的压倒性镇压力量之间悬殊的对比，似乎革命暴动根本就是多余的、无意义的政治行为。

(现象)才能更好地得以理解”。^① 本节从政治认同、斗争手法和斗争周期三方面,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简称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个案,对1927年革命暴动做综合分析。

一 革命暴动中的政治认同

(一) 革命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

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暴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运动基础。这种基础,一方面体现为暴动领导者对起义前政治形势,特别是政治机遇的分析,同时还隐含着暴动领导者对革命暴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未来前景的预期。“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始。”^② 对于1927年革命暴动而言,社会运动基础意味着革命形势,“包括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的明显分裂,与之相伴的每一个政党都分别控制着该国某些重要地区或某些统治工具”。^③ 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拥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前者拥有作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成果的合法政权,以及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正规军事力量;后者则自认为可以把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理所当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甚至因此乐观地认为革命仍然处于高涨的阶段。南昌起义和“八七”政治局紧急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评估相对乐观,认为革命形势有利于暴动和使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如“八七”会议后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就认为:“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稳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④

尽管中央认为南昌起义的条件是成熟的,但事后证明:“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尚多同志武装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三派联合成熟的工农及军事力量削减与消沉

① [美]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泰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以后所引此书均为同一版本,恕不一一注明。

② [美] 查尔斯·蒂利、西德尼·泰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③ 同上书,第192页。

④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以后所引此书均为同一版本,恕不一一注明。

之时；就空间说，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① 所以，南昌起义时机的选择其实并不理想。但考虑到起义所依赖的正规军事力量仅有贺龙和叶挺二部的尴尬现实，以及张发奎欲借九江会议之机扣押叶、贺的危急情势，选择此时起义仍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南下广东的进军方向，不能充分利用既有的社会运动基础。南昌起义拥有 1927—1928 年共产党领导的各次武装暴动中人数最多也最正规化的军事力量，但是即使以如此正规的军事力量作为主要动力，若无工农群众运动的呼应，也很难有所作为。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由于“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甚至“因受 AB 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②

而秋收起义则充分证明，农民的革命情绪并没有如中央设想的那样高涨，能够天然成为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起义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③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省政府、省党部对于铲除暴徒，排除共产，遏制工农运动完全秉承唐、何意旨，正在进行，省城公安局之厉行清乡查户口颇为可怕。”^④

白色恐怖高压之下的农民运动，显然很难复制北伐战争后受到广东革命政府鼓励的合法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辉煌。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虽然畏惧白色恐怖，可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农民运动昔日辉煌的怀念，使他们仍然有可能支持共产党的暴动鼓动。“佃农的二五减租也没有了，租金利息也没有了，地主的帐又要还了，说话也无从前自由了，土豪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因此农民渐渐感觉，土豪劣绅到底是欺骗他们的，暴徒专政的时候，实在要好一点。因此他们怨恨而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 年 6 至 7 月）》，载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6 页。

②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经过与教训（1927 年 10 月）》，载《南昌起义》，第 85 页。

③ 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 年 9 月 27 日）》，载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4 页。以后所引此书均为同一版本，恕不一一注明。

④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1927 年 7 月 23 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32 页。

思念共党了，希望共党卷土重来。”^① 这种局面仍然是可以被共产党人寄予希望的社会运动基础。

黄麻起义前的社会运动基础，则比湘赣秋收起义的情形乐观许多。湖北的秋收暴动使湖北农村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斗争态势，从而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奠定下社会运动基础。大革命后的湖北，“在乡间，只要提起打倒土豪劣绅，绝对没有人反对；农民对付土豪劣绅，也不似从前采取儿戏手段，绳子政策，而直接处死，并没收其财产，焚毁其房屋，杀戮其家人”。^② 黄麻起义前的黄安，农村阶级斗争壁垒森严，形成各自军事化的对立局面，尤其有助于革命暴动形势的酝酿和形成。“阔人老爷们有阔人老爷们的组织，穷苦的朋友有穷苦朋友们的组织。阔人老爷们的最有力量的组织是枪会……穷苦朋友们的组织是协会、秘密的‘协富会’、有刀枪和来复枪的‘防务会’、义勇队及专门杀土豪劣绅的没有名义的团体。”^③ 特别是，黄麻起义前，黄安党组织已经在当地农民群众中拥有较深厚的影响。“党争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地位，动用‘至诚学款’大量开办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夜校”，扩大党对群众的组织和影响，同时党“通过清算委员会的组织，清查黄安的义仓及平巢委员会”，^④ 与土豪劣绅展开经济斗争。这一切都提高了党在农民中的威信。

广州起义前，广东省委本来希望借助南昌起义军的南下，为广东的革命暴动顺理成章地铸成有利于全省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但是，南昌起义军不幸溃败于潮汕地区，这迫使广东省委更加强调广东自身的条件，认为：“这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特别是省委分析认为：“李黄张已成为鼎立之势，而直到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

^① 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0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载红安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以后所引此书均为同一版本，恕不一一注明。

^③ 《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4日），载《黄麻起义》，第78页。

^④ 郑位三：《红色的黄安》，载《黄麻起义》，第135页。

近。”^① 起义前夕，广东省委准备借“在目前张李战争当中，张内部又将发生分化，这就是朱晖日与黄琪翔由暗斗而至明争之酝酿”的时机起义。而陈璧君衔汪精卫命要求广州当局解决受共产党影响的教导队的危急形势，更加快了起义准备的进程。^②

（二）政治认同的界定

政治认同对于社会运动组织者推进其运动进程至关重要。“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身份。”^③ 政治认同的目的正是使行动者获得某种身份，“它将人们与某些社会情境而不是其他人联系起来，通过将这些人吸收进那些情境来激活这些身份”。^④ 在1927年革命暴动中，共产党人通过唤醒工农士兵暴动者的阶级情绪，以及大革命前后工农运动既得利益实现和丧失的反差，实现对他们暴动者的身份赋予。为此共产党人适时抛弃了国民革命的招牌，而树立起土地革命的旗帜。

1. 革命旗帜的改易

在革命暴动中，政治认同，特别是涉及敌我对立营垒的身份赋予，能够起到有效动员工农群众参加暴动，鼓舞其暴动情绪的作用。

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并未断然放弃国民革命的宗旨，即便是在“八七”会议时仍然在强调应继续张扬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可在之后的暴动实践中，这一宗旨很快被湖南、湖北两省的秋收暴动所抛弃。起义者正式举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

南昌起义期间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便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宣称：“此革命委员会之职责，在继续本党革命之正统。于最短期间，当确立一革命之新根据地，以便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党国大计，重新选举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以便指导全

①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关于最近工作纲领》（1927年10月15日），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以后所引此书均为同一版本，恕不一一注明。

② 《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关于张李之战及广州暴动之准备和策略》（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第114—115页。

③ 《斗争的动力》，第71页。

④ [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